



Distr.: General
23 April 2015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三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

2015年7月13日至16日，亚的斯亚贝巴

第三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

2015年7月13日至16日，亚的斯亚贝巴

大会主席编写的第三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筹备进程实质性 非正式会议摘要

2014年10月至11月，纽约

一. 引言

1. 大会在其第 68/279 号决议中，请大会主席提出第三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 (2015 年 7 月 13 日至 16 日，亚的斯亚贝巴) 筹备进程工作方案，包括就相关主题领域举行实质性非正式会议，会期最长不超过八个工作日。
2. 考虑到在 2014 年 10 月 17 日筹备进程开幕会议上提出的看法，大会主席于 2014 年 10 月 24 日致函全体会员国，提出了筹备进程工作方案，包括实质性非正式会议的时间安排。
3. 为此，召开了两轮实质性非正式会议，主题分别为“调动和有效利用资源” (2014 年 11 月 10 日至 13 日) 和“有利环境、系统问题、后续工作和在伙伴关系中学习” (2014 年 12 月 9 日至 12 日)。筹备进程共同召集人乔治·威尔弗雷德·塔尔博特(圭亚那)和盖尔·彼得森(挪威)主持会议。
4. 会员国对会议兴趣浓厚，各区域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派出财政与发展合作部长等高级别代表参加会议。发展筹资主要利益攸关方以及民间社会组织和企业部门实体，全面参与会议并发挥了积极作用。
5. 按照大会第 68/279 号决议第 10 段，大会主席在两位共同召集人和联合国秘书处的协助下，编写了实质性非正式会议摘要，作为亚的斯亚贝巴会议筹备工作的投入。两次会议的摘要如下。



二. 开幕会议(2014年10月17日)

开幕部分

6. 大会主席、联合国秘书长、埃塞俄比亚常驻联合国代表泰凯达·阿莱穆、主管经济和社会事务副秘书长吴洪波兼国际会议秘书长在开幕会上发言。

7. 大会主席致开幕词，强调全面调动公私部门及国内和国际等财政资源，加强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是成功执行 2015 年后议程的关键。国际会议的实质性筹备工作将以下列文件为指导：《蒙特雷共识》；《发展筹资问题多哈宣言》；可持续发展融资问题政府间专家委员会的报告；可持续发展目标开放工作组的报告；以及秘书长关于 2015 年后发展议程的综合报告。他呼吁开展包容性筹备进程，邀请包括金融和贸易机构、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在内的所有利益攸关方进行参与。他着重指出了有待会议解决的一些难题，特别是履行官方发展援助承诺、加大国家资源调动力度、公私伙伴关系的作用、为基础设施提供长期资金、以及债务可持续性、国际贸易、改革全球治理和国际金融体系等。

8. 联合国秘书长概述了 2015 年的三项优先工作，即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商定转型性 2015 年后发展议程、通过一项有意义的普遍气候协定。他强调筹资是所有这些工作的关键。国际会议的成果将是 2015 年 9 月联合国首脑会议筹备工作的重要一环，首脑会议将要通过 2015 年后发展议程。《蒙特雷共识》固然打下了坚实基础，但必须应对新的挑战，比如金融危机的影响、中等收入国家的增长、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费用增加。新的筹资框架应该均衡纳入可持续发展的三个层面，并与其他资金流，包括气候筹资实现连贯一致。他呼吁履行以前所作的官方发展援助承诺，强调必须全面调动国家、国际和公私部门的各种财政资源。

9. 阿莱穆先生对埃塞俄比亚政府能够主办国际会议感到荣幸，并对会议作出了承诺。他认为，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执行手段，确保首脑会议取得成功并通过 2015 年后发展议程。他呼吁各国展示出强大的政治意愿和巨大承诺，为发展调动更多资源和财政支持。他说，这次国际会议将取得比蒙特雷会议更大的成果。

10. 主管经济和社会事务副秘书长强调，亚的斯亚贝巴会议将商定可持续发展综合筹资框架。他重申了会议的主要重点领域，即(a) 审查《蒙特雷共识》和《发展筹资问题多哈宣言》的执行情况；(b) 应对调动和有效利用可持续发展资金的新挑战；(c) 振兴发展筹资后续进程。他指出了政府间委员会报告的一些重要内容，这些内容将为会议提供重要投入。特别是，报告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筹资分析框架，提出了超过 115 个政策方案供各国选择，并提出了可以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伙伴关系的领域。他以会议秘书长的名义呼吁会员国派出高级别代表参加会议，呼吁所有伙伴，包括主要的机构利益攸关方、民间社会和企业部门积极参与。

实质性部分

11. 会议随后进入实质性部分，世界银行行长千年发展目标、2015年后进程和金融发展问题特使马哈茂德·穆希丁发言，并与会员国和利益攸关方进行了一般性讨论。

12. 穆希丁先生重申，应调动各种财政资源满足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但是，光靠资金并不够，还需要实地的有利环境和有效协调的支持。他强调，2013年官方发展援助增加到了1300亿美元，但是最不发达国家的占比却有所减少。他呼吁官方发展援助更好地针对最需要的国家，并着重指出官方发展援助对于利用其它财政资源具有催化作用。他强调，应提高公共部门资金，包括调动国内资源和公共支出的效力。多边开发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金组织)将于2015年春季拟定发展筹资联合议题文件，并编制一系列各种处境的国家说明。

13. 在随后进行的讨论中，会员国就国际会议筹备进程的拟议路线图交换了看法并提出了意见。

14. 有会员国表示，希望采用《蒙特雷共识》的结构和重点领域，也有会员国强调会议成果应该反映并针对新的问题，并捕捉所有资金流。与会者讨论了官方发展援助与气候资金重复、南南合作、混合型与创新型筹资、以及贸易和主权债务重组等具体问题。

15. 与会者一致认为，官方发展援助十分重要。有会员国认为，国际公共资金，特别是官方发展援助，应该成为国际会议实质性筹备工作的核心部分。也有会员国认为，其他资源也应成为议程的组成部分。

16. 有会员国强调，会议的筹备进程和成果文件应适当考虑到处境特殊国家的需要，特别是非洲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内陆发展中国家。

17. 与会者指出，应建立强大、有效的后续机制，并强调必须建立强大的数据和问责框架。

三. 调动和有效利用资源(2014年11月10日至13日)

第1次会议：“全球大环境”（2014年11月10日）

18.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作主旨发言，强调千年发展目标取得的进展。她认为，可持续发展目标应该扩大并实现转型，应该强调消除贫穷、尊重环境极限以及和平的法治社会。根据政府间委员会报告提出的指导，应该认为发展筹资是“蒙特雷会议的扩展”。应该审查《蒙特雷共识》的进展和应对新挑战的措施，特别是在官方发展援助和国际公共资金、调动私人资金、以及通过改善风险管理调动抗灾资金(尤其是气候变化以及冲突、暴力和缺乏安全保障)方面。

19. 随后，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发展筹资办公室主任 Alexander Trepelkov 主持进行了小组讨论。他提出了全球环境中的一些主要挑战，这些挑战事关今后的 2015 年后筹资框架，包括各国经济实力的变化，认识气候变化对全球繁荣的影响，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之后增长趋缓，许多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现象加剧。

20. 讨论会上发言的有：副秘书长兼非洲问题特别顾问马吉德·阿卜勒-阿齐兹；巴西财政部主管经济监测事务秘书 Pablo Fonseca；基金组织主管战略、政策和审查副主任 Seán Nolan；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主任(高级合伙人)兼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全球发展理事会副主席 James Manyika；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发展筹资办公室政策分析和发展处处长 Shari Spiegel。

21. 阿卜勒-阿齐兹先生概述了非洲在千年发展目标方面取得的进展，采取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实现了经济增长。但是，仍需处理尚未完成的工作，弥合基础设施和气候筹资方面的重大差距。应建立更加强大的有利环境促进经济增长和投资，同时应加强能力调动国内资源、管理自然资源和处理数据。应利用贸易潜力，履行官方发展援助承诺，进一步探讨创新型筹资文书。

22. Fonseca 先生以巴西成功公私伙伴关系为例，强调了基础设施筹资的机会与挑战。由于监管收紧，银行在基础设施融资方面面临制约。因此，已经开始把资本市场作为筹资对象。这给风险管理带来了挑战。他指出，公私部门投资有助于促进长期增长，减少作为中等收入国家特殊挑战的不平等现象。但是，必须正确认识不同国家的条件和国情。这种项目的可行性研究以及复杂耗时的筹备难以应付，特别是体制环境较差的国家。

23. Nolan 先生用《世界经济展望》的数据阐述了 2002 年以来全球大环境的一些变化。印度和中国经济增长势头强劲，一些低收入国家也有大幅增长，而高收入国家 2008 年金融危机后增长低迷。全球经济一体化得到推进，对发展中国家的私人资金流动在金融危机期间下降后又大幅反弹。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降低，政府收入有所增加。与 15 年前相比，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可以以更好的条件进入私人资本市场。但是，短期内高增长率不会再现，即使低收入国家的前景有所改善。

24. Manyika 先生论述了全球技术和创新的主要趋势。繁荣在增加，随着技术的传播到 2025 年将超过 20 亿人加入消费大军。互联网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已经超过农业等许多其他部门，即使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之间的重大差距依然存在。在技术传播的同时，经济实力将从西方向东方和南方转移，城市化规模扩大。到 2025 年，全球的物资、服务和资金流动将至少增加一倍。知识密集型流动的重要性将大于劳动力和资本密集型流动。面临的挑战是：实现包容性增长，创造就业，管理资源压力。

25. Spiegel 女士介绍了 2002 年以来资金流动的趋势。资金流动全面增加，而对最不发达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却不断下降。私人资金没有分配到最需要的国家和

部门。许多私人资金波动性强，供资期限短。特别是，被视为长期投资提供者的机构投资者，一般通过金融中介进行投资，并期望短期获利。政府必须制定政策，刺激长期投资。一些国家和部门亦可采取公私部门混合筹资，但是最需要的国家往往没有成功建立和管理公私伙伴关系的能力。

讨论

26. 会员国指出，亚的斯亚贝巴会议成果文件应该在蒙特雷和多哈会议及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的基础上，为 2015 年后发展议程提出筹资框架。会员国确认更新筹资框架，以反映经济实力转移等全球和区域变化。会员国认为，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环境和社会三个层面是这一新框架的组成部分。

27. 会员国认为消除贫穷是会议的核心目标，强调官方发展援助和有关的其他国际公共资金极为重要，特别是应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这种援助和资金，并敦促捐助国履行现有的各项承诺。一些会员国强调，南南合作是北南合作的补充而不是替代。

28. 一些会员国认为，鉴于可持续发展议程比千年发展目标范围更大，最不发达国家需要更多资源。提出的建议包括把官方发展援助的 50% 用于最不发达国家，以及免税和无配额的市场准入。

29. 会员国提出了改革国际金融系统和治理的问题，包括发展中国家加大参与力度，出台债务重组机制等。

30. 民间社会代表着重指出了一些关键挑战，特别是为内容广泛的可持续发展议程调动资源，克服金融危机后果，解决不平等；强调了税收不足、未履行的官方发展援助承诺、公私部门混合筹资的挑战等问题；呼吁解决国际金融体系中的治理问题，建立债务法律框架，成立包容性的税收论坛。

31. 私营部门代表强调，必须为城市建立专门的筹资机制，审查机构和监管框架，进一步减少风险。

第 2 次会议：“调动国内可持续发展资源” (2014 年 11 月 11 日)

32. 普林斯顿大学的 Atul Kohli 作基调发言，强调有利的全球环境固然重要，但发展主要是国家挑战。他指出，从历史角度来看，国家要实现工业化、实现发展，离不开国家的积极作用，更离不开外国资金。他用亚洲国家的发展轨迹阐明他的观点：提高国内储蓄率；减少外债；增加外国直接投资的多样化；进一步实现经济多样化，增加制造品出口；减少不平等。

33. 随后进行了圆桌讨论，基金组织财政事务部司长 Benedict Clements、阿根廷经济和财政部主管公共收入副秘书长 Luis Maria Capellano 和芬兰税务总局局长 Pekka Ruuhonen 参加讨论。非洲税务正义网络主任 Alvin Mosioma 主持讨论。

34. Clements 先生表示，20 年来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国内生产总值中的税收占比全面提高，但还是大大低于高收入国家。发展中国家增值税收入增幅大于公司

税和个人所得税收入，而营业税收入有所减少。他强调，发展中国家在保护公司税基不受侵蚀和利润转移方面面临巨大挑战。他提出了五项优先任务：加强税务管理；制定有效的房产税和个人所得税；堵塞国际避税漏洞，减少浪费的税收优惠政策；建立有效的采掘业征税机制；能源价格应反映对环境的破坏；深化经验分享与合作。

35. Capellano 先生注意到政府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以及调动和有效利用资金的挑战，强调税务文书对于平等支持经济增长、可持续发展和资金再分配等目标十分重要。他介绍了阿根廷采取税务措施的例子，包括基本货物和服务税减免，个人所得税和财产税采用累进税率，采取特别措施促进投资、研究和就业等。他指出，阿根廷坚定地致力于打击国际避税，强调必须在技术和人力资源领域开展国际合作与投资，加强国家税务管理的能力。

36. Ruuhonen 先生概述了芬兰的征税经验，着重介绍了国家税务管理在实现高度合规方面的作用。他强调指出，如果没有税务局的合规工作，未征税收可能高达预期税收的 45%。但是，像同芬兰一样把征税漏税差距降低至 3% 至 5% 是可行的。他表示，由于纳税人对税务管理的信任，长期以来芬兰实现了税务高度合规。他强调，这种信任的建立在于税务管理的效率、税务数字化、提高税务服务的便利度以及预先报税等其他方面的支持。

37. Mosioma 先生针对上述发言表示，对税收是可持续发展最为重要和可靠的筹资来源已经形成广泛共识。他认为，在实行税务改革增加国内公共资金和减少不平等方面，应该十分谨慎地对分配影响，特别是消费税进行分析和监测，消费税可能产生不利的递减影响。他强调必须扩大税基，解决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问题，提高税务透明度，全面重新考虑实际意义不大的税收优惠政策。他呼吁加大国际税务合作，并设立由联合国主持的新的政府间机构，牵头启动包容性的国际税务规则改革进程。

讨论

38. 一个关键主题是，有效的官僚机构和有效的税务管理，以及在这方面能力建设可能发挥的作用。与会者进行了辩论，应强调通过有效沟通与合规氛围建立信任，还是通过简单的改革提高行政效率实现合规。与会者呼吁把更多的官方发展援助用于建设税务管理能力。

39. 与会者提出，再分配政策旨在减少不平等，应该成为由发展主导的税务改革的基础。有发言者赞成征收消费税，也有发言者认为消费税具有递减影响。与会者并就税收对妇女权利和性别平等的影响进行了讨论。

40. 发言者强调必须应对有害的税务竞争，强调吸引外国投资缺乏免税等优惠措施。有发言者说，税务优惠措施的效力喜忧参半，善治是通过税务优惠增加投资的前提。一些发言者指出，应制定公司税起征门槛，并就制定税率开展区域合作。

41. 讨论的另一主题是非法资金流动，重点是商业逃税和通过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避税。有人表示，提高税务透明度和加强信息交流机制应该成为发展中国家防止税收流失的第一要务。与会者认为，加强国际税务合作对于支持包容性和参与性进程至关重要，这一进程旨在进一步执行以发展为导向的征税办法。与会者并呼吁推动偷盗资产返回领域取得更大进展。

42. 一些发言者认为，对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等处境特殊国家而言，调动国内资金不足以执行国家发展优先工作。由于资金资源基础有限、气候变化、海平面上升和经常发生自然灾害等不利影响成本加大，这些国家应该得到更多、更有效的官方发展援助，更好的市场准入和融资机会。

第 3 次会议：“将可持续发展标准和有效使用公共资金问题纳入主流”（2014 年 11 月 11 日）

43. 政府间可持续发展筹资专家委员会共同主席 **Mansur Muhtar** 主持会议。会上发言的有：基金组织财政事务部司长 **Benedict Clements**、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副主任 **Vinicius Pinheiro**、世界银行治理和公共部门管理做法代理主任 **William Dorotinsky**、尼泊尔财政部副秘书长 **Yoganath Sharma Poudel**、塔林技术大学创新政策和技术治理教授 **Rainer Kattel**；国际预算伙伴关系的 **Claire Schouten**。

44. **Clements** 先生介绍了基金组织的一项研究，发现全世界能源补贴约为 2 万亿美元，其中大约 5 000 亿美元为明确的税前补贴。他指出，22 个国家个案研究揭示了补贴改革的成功因素，包括制定全面的改革计划，提出明确的改革长期目标；制定影响深远的传播战略；按适当的阶段和顺序进行改革；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包括改进能源收费办法；旨在保护穷人的定向缓解措施，最好是定向现金转让；以及定价非政治化。

45. **Pinheiro** 先生说，金融危机显示，社会保护的积极反周期影响十分巨大，因为它支撑了累积的需求和复苏。他认为，由于开支具有很大的倍增效应，无需为方案支付费用。主要的制约因素是政治意愿。他强调筹资没有灵丹妙药，并提出了五种备选办法：调动国内资源；调整现有支出的走向；增效节余；国际资源；债务减免和债务重组。

46. **Dorotinsky** 先生介绍了善政与增长的积极互动关系；以及腐败对提供服务和私营投资的有害影响。世界银行不仅重点进行技术干预，也邀请公民、私营企业和政府参与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处理施政与腐败的关系。他列举了改善提供服务取得成功的例子，包括利用多方参与和提高透明度；并强调了最高层的政治局面和施政的重要性。

47. **Poudel** 先生着重阐述了促进性别平等的预算编制，并提到了尼泊尔为实现两性平等和赋予妇女权能而设置的定向政策和方案。展望未来，一部促进两性平等的新宪法和援助实效议程应能带来机会。依然需要实施针对妇女的社会保护措施，并解决妇女参与经济活动比例过低的问题。

48. Kattel 先生阐述了公共采购作为发展筹资方式的问题，强调应通过创新为发展提供公共资金；对此，采购是私营部门资金的重要来源，也是推广技术的一种方式。他着重提出了采购创新的两种类型：创造新的技术解决方案及其市场；推广有助于加强市场和提高竞争力的新的和现有的技术解决方案。他强调，无论采取何种方式，政府都需要培育采购能力和技能，办法之一是利用熟练人员来规划和评价采购工作。

49. Schouten 女士谈及了预算透明度和公民参与问题，并提出了三项建议：保证针对每一发展目标的政府收入、援助和开支均具有充分的透明度；政府应建立适当机制邀请公众参与预算编制；监测政府在每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上的开支，以此作为“执行手段”。这就需要确定在全球和国家一级监测政府每项目标开支的程序。

讨论

50. 讨论围绕两大主题进行，即提高政府支出效率和更好地针对弱势群体。技术有助于连接现金转移、教育、粮食和医疗保健方面的信息和政策。各国之间的技术援助和信息交流也是至关重要的。

51. 会议还讨论了除化石燃料以外的其他补贴。一些发言者强调，应采用切实可行的办法，总体倾向于有针对性的补贴，将资源集中用于提供基本服务。

52. 一些发言者讨论了腐败造成的资金流失对有效开支的破坏问题，强调部分采购存在腐败和缺乏透明度问题。同时，需要谨慎行事，慎防因处理腐败而设置严苛的投标规定，从而将国内企业拒之门外。

53. 在关于社会保护最低标准的讨论中，与会者提议把公司按要求缴纳社保作为其参加政府采购投标的条件。还有人建议，各国政府应根据本国的收入水平，制定社会服务最低支出一揽子计划。

54. 与会者讨论了通过加强监督和最高审计机构改进国家治理和提高透明度的重要性，建议要求所有公司在财务披露中列出向政府缴纳的各种款项，并建议各国政府公布掌握的文件，如预算数据和采购合同等，从而提高透明度和加强问责制。

第 4 次会议：“官方发展援助和援助实效”（2014 年 11 月 12 日）

55. 布鲁金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Amar Bhattacharya 致开幕词，指出蒙特雷会议以来，国际公共资金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强调背景发生了很大变化。在供应方面，捐助国的财政压力影响了官方发展援助的提供，因而其他资源变得更加重要。在需求方面，发展中国家 80% 的人口生活在中等收入国家，这意味着对官方发展援助会有新的需求。

56. 会上发言的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主席 Erik Solheim、发展倡议参与及影响主任 Harpinder Collacott、公共政策顾问 David Roodman、坦桑

尼亚联合共和国财政部常务副秘书长 Dorothy Mwanyika、援助非洲现实网络协调员 Vitalice Meja；海外发展所研究员的 Smita Nakhoda。

57. Solheim 先生强调指出，近几十年来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资源充足可以满足资金的需要，但是官方发展援助仍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他强调了亚的斯亚贝巴会议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的四个领域：增加官方发展援助，尤其针对最不发达国家的援助；通过提供有针对性的官方发展援助和解决非法资本流动，支持调动国内资源；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私人投资的鼓励措施；更好和更有效地利用官方发展援助。他并报告了发展援助委员会为更新官方发展援助定义所作的持续努力，既要确保过程的透明度，又要避免人为提高官方发展援助的数字。

58. Collacott 女士强调，官方发展援助对消除贫穷十分重要。她指出，83%的赤贫人口生活在筹集国内公共资源的能力非常有限、而且未来增长预测较低的国家。出于这些原因，官方发展援助应针对最贫穷地区。目前官方发展援助解决贫穷问题的针对性好于其他资金流动，但可以也应该得到进一步加强。

59. Roodman 先生强调，要建立一个更加多极的世界，就要共同解决全球的难题，这突出说明应从贸易、移徙和影响发展的其他政策这些更广阔的背景来审视援助。他强调指出，事实证明有些类型的援助是有效的，如医疗援助和直接捐助。这些成功在为官方发展援助创造和保持政治支持方面至关重要。

60. Mwanyika 先生表示，官方发展援助在坦桑尼亚发挥着重要作用。坦桑尼亚倾向于预算支持的援助方式，有利于按照本国的轻重缓急并在议会的监督下利用援助。因此，她对捐助方预算支持兴趣日减感到遗憾。为进一步提高官方发展援助的实效，她呼吁加强援助流量的可预测性并利用国家系统和相互问责机制。

61. Meja 先生强调，发达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必须达到国民总收入 0.7% 的目标，并呼吁为实现这一目标建立有约束力的机制。他指出，许多中等收入国家仍要依赖官方发展援助来满足某些需求，强调釜山援助实效原则的重要性，特别是民主所有权和所有利益攸关方的参与。联合国发展合作论坛等论坛能以包容的方式使所有利益攸关方共同商讨有关议题。

62. Nakhoda 女士强调，最贫穷的人群集中在最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为应对这些挑战，发展中国家应得到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作出的承诺提供的国际公共资金。然而，这些资金与用于发展筹资的资金出自同一来源。官方发展援助在提供快速启动资金方面可以发挥重大作用，而气候方面的官方发展援助已有快速增长。这些重叠对资源的分配具有重大影响，其中气候方面的官方发展援助更加面向中等收入国家以及亚太地区。

讨论

63. 许多代表团强调必须兑现目前的官方发展援助承诺，一些与会者呼吁提出明确和具体的时间表。鉴于越来越多的国际公共资金流动专门用于发展中国家减贫

和适应气候变化，这些资金流大致作为官方发展援助，可能会减少针对最不发达国家的援助，因此需要增加官方发展援助。

64. 有代表呼吁提高官方发展援助的实效，如通过不附带条件的援助和更多地利用预算支持作为援助的一种方式，来提高官方发展援助的可预测性和灵活性。

65. 与会者对官方发展援助最可取的分配方式看法不一。与会者普遍认为，贫困问题应当是官方发展援助优先关注的问题。与会者还呼吁利用官方发展援助来提高国内资源的调动能力，也有与会者指出，许多国家从税收筹集收入的潜力仍然非常有限。

66. 许多发言者赞同官方发展援助更加侧重最不发达国家和其他易受影响国家。与会者一致认为，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不断下降的趋势应该扭转。有人建议将全部官方发展援助的 50% 投向最不发达国家。另有人表示关切，根据人均收入确定的国家分类和援助分配只会忽视结构性弱点等其他因素，并强调许多中等收入国家仍然需要官方发展援助。

67. 与会者就发展援助委员会更新官方发展援助概念定义提出了一些问题。发言者表示关切目前对优惠条件的计算方法，指出在重新估量中考虑到国家风险的建议可能刺激向受债务困扰风险的国家增加借贷。

第 5 次会议：“国际公共筹资的其他来源：优惠贷款、创新筹资来源及南南合作和三角合作”（2014 年 11 月 12 日）

第 1 讨论小组：利用其他来源的国际公共融资

68. 布鲁金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Amar Bhattacharya 在介绍发言中指出，利用多边开发银行调动更多资源和提供资金潜力巨大。

69. 小组成员有：世界银行主管发展筹资副行长 Joachim von Amsberg、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发展政策和融资主任 Gargee Ghosh；政策和评价顾问 Rodney Schmidt。

70. von Amsberg 先生着重指出，多边开发银行的作用是利用公共资源调动大量私人资源，促进对可持续发展的投资。他指出，应针对最贫穷国家并投资公益物，集中使用条件最优惠的资源，以实现效率和公平性。他并谈及了进一步利用金融杠杆、利用优惠融资窗口等方式，进一步加强世界银行贷款的影响力度。

71. Ghosh 女士表示，如果落实以下一些具体的创新措施，可以为发展释放大量额外资源：将官方发展援助赠款专门投向最贫穷国家以进行基本的人类发展；为中低收入国家提供有针对性的帮助以及获取优惠资金的途径；协助发展中国家实现税收与国内总产值的比率达到 20% 的目标；加强对私人资金的支持，用慈善和优惠资金填补剩余的资金缺口；为研发规模投资提供资金。

72. Schmidt 先生重点述及创新型发展筹资机制(如金融交易税)为可持续发展筹集资源的潜力。据估计,2016年11个欧洲国家征收的金融交易税每年将产生450亿美元,如果在整个欧洲联盟征收,可以筹集750亿美元。然而,目前还没有将这些资源用于发展的决定。他最后指出,碳税是为可持续发展带来巨大新资源的一种替代办法。

73. 在随后的讨论中,各代表团注意到创新发展筹资问题领导小组争取调动资源以补充官方发展援助的努力,强调领导小组愿意为探讨2015年后发展议程作出建设性贡献。

74. 与会者指出,优惠贷款会引发债务危机,而世界银行的国际开发协会已经制定政策,仅向债务困扰国提供贷款。

第2讨论小组:南南合作和三角合作

75.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支助和协调办公室主任 Navid Hanif 首先发言指出,2011年南南合作(形式为贷款、赠款和技术合作)估计达到160至190亿美元,主要特点是需求驱动、可预测、执行速度快。

76. 小组成员有:印度新德里发展中国家研究和信息系统总干事 Sachin Chaturved、埃及促进发展伙伴关系机构秘书长 Hazem Fahmy、埃塞俄比亚财政和经济发展部联合国机构与区域经济合作局主任 Admasu Nebebe 和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助理主任 Cosmas Gitta。

77. Chaturvedi 先生报告了南方国家为处理其优先事项而正在建立的新的机构,包括新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及清迈倡议一类的储备基金。这些区域努力为南方国家的经济利益提供了保障。

78. Nebebe 先生报告了南南合作对埃塞俄比亚,尤其是基础设施投资领域的重大影响。官方发展援助在帮助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但重点往往偏离调动国内资源、贸易和投资。南南合作是对北南合作的成功补充。他并注意到南南合作在知识和技术转让中发挥的关键作用。

79. Fahmy 先生介绍了埃及的发展合作。埃及历史上有两个技术合作基金,最近又成立了发展伙伴关系机构。他介绍了卫生、教育和其他领域伙伴关系的几个具体例子。

80. Gitta 先生强调了联合国系统在促进南南合作中的作用,包括分享知识和经验,支持区域合作倡议及新的混合融资形式,以及调动私营部门和慈善行为体。

81. 在随后的讨论中,一些代表团着重介绍了南南合作和三角合作方案中的积极经历,并讲述了具体的成功案例。与会者一致认为,南南合作是北南发展合作的补充而不是替代。许多与会者认为,传统捐助方可以在南南合作中发挥作用,如

在知识和技术转让等领域，并通过南方内部的资源来支持知识转让。发言者呼吁联合国系统加大对南南合作的响应，并呼吁把南南合作纳入联合国工作的主流。

第 6 次会议：“金融部门发展、包容性金融和金融稳定之间的关系”（2014 年 11 月 13 日）

82. 24 国集团秘书处执行主任 Marilou Uy 在介绍性发言中强调，财政部门需要为实体经济做出贡献。她鼓励发言者探讨金融部门发展的不同层面及相互关联。

83. 在会议上发言的有：世界银行发展研究小组金融与私营部门研究小组首席经济学家 Leora Klapper、麻省理工学院 J-PAL 政策主管 Claire Walsh、菲律宾中央银行总裁 Chuchi Fonacier、世界信用社理事会高级副总裁 Peter Graves、世界银行移民与汇款主管 Dilip Ratha；联合国资本发展基金普惠金融实践领域主任 Henri Dommel。

84. Klapper 女士着重强调了金融部门发展应当争取实现的四个目标：金融深度（以私人信贷与国内总产值的比率衡量）、获得金融服务的机会、提高信贷中介效率和金融稳定。政府在提供消费者保护和打造监管环境支持金融稳定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她提及世界银行最近的数据显示，仍有 25 亿人无法利用银行业服务，其中以妇女居多。她强调了创新技术在促进金融包容性方面的潜力。在这方面，监管机构应扶持创新，从而允许替代性部门（如移动银行业）业者参与竞争。

85. Walsh 女士介绍了包容性金融的一些随机对照试验结果，特别是小额信贷和小额储蓄方面。根据 7 个国家的 8 项评估，小额信贷对收入未显示任何重大影响，对企业投资仅产生些微的积极影响。但是，小额信贷帮助贷款者促进消费，应对风险和冲击，对营养、性别平等、赋权和福祉有着积极影响。另一方面，小额储蓄产品对财富资产和收入产生了积极影响，但这一结果是由小部分经常用户所驱动的。

86. Fonacier 女士分享了菲律宾在包容性金融战略中取得的经验教训。菲律宾面临巨大挑战，37%的城市和区县没有银行办事处，银行服务集中在高收入地区。她强调需要打造有利环境并制定规章制度。技术创新是关键因素，可以帮助实时以较低费用为更多的人服务。她强调，需要管制和监控小型金融机构和电子货币供应商，特别是关注其资本的充足性、许可证发放程序、管理和风险管控。她着重指出，有必要采取适当方式，确保需要的措施与业务水平相符。

87. Graves 先生说，他的机构代表了 103 个国家的 2.08 亿信用社成员，拥有资产 2 万亿美元。尽管非洲、中东和亚洲的信用社成员和资产规模小于其他区域，但亚洲和非洲有很多微型信用社。信用社是民主管理的非营利机构。信用社的重点主要在于个人和家庭，但目前的挑战是向中小企业发放组合贷款。

88. Ratha 先生着重指出，2013 年汇款达到 4 130 亿美元。他认为，汇款比外国直接投资更稳定，而且可以充任对穷人的保障。主要的任务是降低一直过高的贷

款费用(全球平均为 8%，非洲平均为 13%，非洲国家内部平均为 30%)。他建议对低于 1 000 美元的汇款放宽全球反洗钱和反资助恐怖主义规则，同时废止与邮局的独家伙伴关系。此外，建立非营利性汇款平台可能会扰乱市场，并强行推动变化。

89. Dommel 先生强调，联合国资本发展基金是少数几个拥有资本(赠款、贷款和证券投资)的联合国机构之一。资发基金利用自身资源帮助获取比信贷更加重要的国内储蓄产品。由于其预算相对较少，基金试图以催化方式利用有限资源，以利用获取国内商业贷款的机会。基金并推动南南合作，将股权投资引入微型储蓄机构。

讨论

90. 与会者指出，国际会议将激发推动全面包容性金融战略的势头。各国政府可以转为数字财政支付，以此发挥牵头作用。

91. 几位与会者在讨论金融包容性时强调，必须消除性别差距。移动支付可在妇女无法获得传统银行服务时发挥作用。此外，金融机构管理部门的性别均衡对于影响机构政策意义重大。

92. 关于随机对照试验，与会者强调，评价的重点是小额信贷对家庭的影响，而不是微型企业。投资小型企业可能更有成效，因为这能够增加就业。

93. 几个与会者强调，汇款是私人经济交易，不应被视为援助的替代。许多发言者强调必须降低汇款费用。一位代表指出，其国家公布了不同的在线汇款费用形成了竞争，使汇款费用降到了 6%。

第 7 次会议：“可持续发展的长期筹资”（2014 年 11 月 13 日）

94. 会议分两个讨论小组进行，由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发展筹资办公室政策分析和发展处处长 Shari Spiegel 主持。

第 1 讨论小组：国际资本流动、长期投资和混合筹资

95. 小组成员有：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投资和企业司主任 James Zhan；欧洲复兴开发银行银行业务执行顾问 Gavin Anderson；AP4(瑞典养恤基金)副首席执行官兼首席投资干事 Magnus Eriksson；睿智基金首席投资干事 Sachindra Rudra；欧洲债务和发展网执行主任 Jesse Griffiths。

96. Zhan 先生概述了外国直接投资流动趋势。发展中国家流动份额增加，达到全球的 54%，但流动仍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对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内陆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水平仍然很低。他认为，扩大投资潜力很大，不仅是由于多国公司通过积累持有大量现金。他强调，必须把外国投资与受援国的发展战略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并建议建立投资促进机构，加大对可持续发展重视，并确保有一系列精心拟定的项目。

97. Eriksson 先生强调，市场高度集中在短期回报上。与许多投资者相比，瑞典养恤基金采取了着眼于 40 年的长期投资做法。这归功于基金理事会确定的任务，即通过管理基金资本增进国家养恤金制度稳定，以期获得最佳的长期回报。因此，AP4 纳入了可持续性等因素，同时采用商业做法，并养恤金受益人服务。

98. Rudra 先生解释说，睿智基金是“影响力投资方”，努力在实现经济回报的同时增进社会福祉。它试图通过解决私营企业早期阶段的资金缺口问题为社会企业家提供支持。许多投资将慈善与营利性投资相结合。他以睿智基金投资印度比哈尔邦一家企业为例，投资始于赠款，在企业公司实现一定的可持续性后，吸引了更多的传统融资。

99. Anderson 先生强调，混合融资是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筹资模式的一个重要模式，银行对任何投资的占比从未超过 35%。混合融资用于可持续发展筹资受到制约的一系列部门，包括可持续能源、基础设施和中小型企业。复兴开发银行与商业银行和机构投资者合作投资项目。尽管一些混合融资项目可能由私营部门提供资金，但纳入公共资金可能会为私营部门开展不同的更可持续的活动创造条件。

100. Griffith 先生认为私人投资不能取代公共投资，强调发展中国家 80% 的基础设施支出是公共筹资。要继续这一做法，必须增加税收，打击逃税、避税和税收竞争。为此，有必要成立联合国国际税务合作问题政府间委员会。Griffith 先生强调，私人投资在低收入国家仍然低迷，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动荡不定，并集中在采掘部门。他强调，必须把重点放在国家开发银行，把其作为调动可持续发展筹资的手段。他强调指出，不宜利用官方发展援助筹集私人资金，公私伙伴关系是最昂贵的融资方式。

101. 在随后的讨论中，一些与会者指出，公私伙伴关系往往最终成了债务工具，而唯一的收入来源从政府流向了私营投资者。与会者强调，这种伙伴关系应调整结构，确保政府不承担大部分风险，而私营部门仍有获利。

102. 关于外国直接投资流动的波动和影响，与会者认为，尽管大量外国直接投资收入作为利润汇回而流出，但仍有很大一部分收入留在东道国，并重新投资。

103. 一个代表团指出，主权财富基金对可持续发展的小额投资可以产生重大影响。也有代表团强调，主权财富基金通常以盈利为导向，不会流向风险/回报比例不利的领域。

第 2 讨论小组：“环境、社会和治理举措增加可持续发展长期投资的潜力”

104. 小组成员有：联合国全球契约执行主任 Georg Kell；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署)纽约办事处主任兼联合国环境管理小组秘书处主任 Elliott Harris；英杰华集

团首席投资干事 Steve Waygood；AP4(瑞典养恤基金)副首席执行官兼首席投资干事 Magnus Eriksson。

105. Kell 先生称，企业界正在发生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因为透明度增加，企业界正在发生变化，市场日益对支持未来增长率的投资持长远眼光。他强调，公司必须自行采取举措，把可持续性标准纳入业务决策。他指出，负责任投资原则倡议十分重要，管理 45 万亿美元的机构投资者已经签署倡议，并强调必须将环境、社会和治理标准纳入公司的投资决策。

106. Harris 先生指出，环境署筹资倡议是环境署和机构投资者的合作项目，旨在了解环境、社会和治理因素如何影响财务决定，以及金融部门参与者如何促进可持续发展。他指出，政府要发挥重要作用，制定奖励办法(改变不可持续和可持续活动之间的平衡)，要求做出披露和拟定银行可以担保的可持续项目。他指出，许多举措要求公司做出披露，但是披露标准化程度不足。

107. Waygood 先生认为，目前的金融体系结构妨碍了可持续发展。他鼓励把环境、社会和治理问题纳入投资标准。应改变价格信号，以把外部因素内部化，使投资者愿意纳入可持续性问题。还需要改变系统内部的奖励办法，减少投资者的短期投资回报。他强调，必须通过公司、投资银行、股票交易所、资产管理人、投资顾问和资产所有人的综合报告，提高各类中间方的透明度。

108. Eriksson 先生强调，长期投资者完全可以纳入可持续性因素。他指出，气候变化是对环境和经济的一个长期威胁，减损了养恤基金的回报。他提到，AP4 制定一个有长期投资前景的低碳战略并进行了投资。作为战略的一部分，AP4 根据标准普尔 500 家公司的碳足迹情况评估这些公司的股票。根据这一标准，100 家公司被排除在外。他强调，低碳基金的表现非常积极，自成立以来取得了高额回报。

109. 在随后的讨论中，与会者提出了一些问题，比如更好地将环境、社会和治理问题纳入公司的报告和决策进程。一些与会者表示，整个投资链的定价和业绩标准有助于改变投资者和企业的短期行为。

110. 与会者呼吁建立问责框架，监测外国直接投资对边缘化群体的影响，并呼吁采用各种方式，将人权纳入外国投资者的投资考量中。

111. 一些与会者提出了如何吸引对最不发达国家的可持续投资问题。有人认为，侧重环境、社会和治理因素的投资可能适合最不发达国家，而且所有利益攸关方在地方一级的适当参与对确保得到适当利益至关重要。

112. 有人提到了秘书长商业和人权问题前特别代表约翰·鲁吉提出的基于以下三大支柱的企业与人权框架：国家有义务提供保护，防止包括企业在内的第三方侵犯人权的行为；企业有责任尊重人权；受害者有更多机会获得包括司法和非司法在内的有效救助。

四. 有利环境、系统性问题、后续进程和伙伴关系经验

第 8 次会议：“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平衡获得信贷和金融市场稳定条例”（2014 年 12 月 9 日）

113. 会议由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和公共事务专业实践教授兼哥伦比亚前财政部长 José Antonio Ocampo 主持。奥坎波先生致开幕词，强调蒙特雷会议对于推动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改革全球讨论十分重要。然而，最近的金融危机暴露了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中的系统性缺陷、监管漏洞和扭曲的激励措施。亚的斯亚贝巴会议有助于创造有利环境，为 2015 年后发展议程提供支撑。

114. 会上发言的有：前泰国银行行长兼金融普惠联盟准会员 Tarisa Watanagase；金融稳定委员会副秘书长鲁珀特·索恩；基金组织战略、政策和审查部主任助理兼新兴市场司司长 Athanasios Arvanitis；格拉斯哥大学国际经济史教授 Catherine Schenk。

115. Watanagase 女士强调，中央银行必须采取政策措施，防止出现繁荣与萧条周期，并根据一国的经济潜力促进其可持续增长。中央银行应开展价格和金融稳定两方面的工作。应避免长期的宽松货币和财政政策，因为这种政策可能造成资产泡沫和失衡，威胁经济的稳定。她提出几个领域供进一步讨论：资本流动与价格和金融稳定的关系；有效监测和评估体系风险；对系统意义重大的国家更多利用金融部门评估方案；分析能力建设；保护中央银行维持金融稳定不受外界干扰的治理结构。

116. Thorne 先生回顾说，2009 年，20 国集团领导人承诺从根本上改革全球金融体系。改革目标是纠正导致危机的断层线，建立一个更安全的国际金融体系，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在他看来，已基本就第一阶段改革达成了一致。下一阶段的改革是应对新的和不断变化的风险，提高银行的复原力，结束“大而不倒”现象，把影子银行转变为具有复原力的市场融资，使衍生产品市场更加安全。金融稳定委员会加强代表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委员会 10 名成员的呼声并定期开展区域协商，努力与发展中国家进行接触。了解监管改革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也十分重要。

117. Arvanitis 先生阐述了基金组织最近为加强全球金融安全网所做的努力。他强调，几十年来系统性危机频发；资本流量波动继续对新兴市场经济体构成风险。作为回应，过去十年里出现了一个多层次的全球安全网，其中包括借助储备积累、双边互换额度、区域金融安排和全球举措的自我保险。他强调，每一层保险都面临各自的特殊挑战。例如，储备积累的机会成本很大；双边互换额度必须应付信用风险问题并与中央银行的任务保持一致；区域金融安排往往规模较小。虽然所有四个层次有重大协同作用，但条块分割也有所增加。

118. Schenk 女士回顾了全球货币体制改革的历史。她强调，1970 年代初期，国际货币体系面临的挑战与当前趋势相似，包括商品价格波动，美元波动的溢出效

应，以及易受资本流量波动的影响。尽管对几项提议开展了辩论，如采用一个替代账户和更多利用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等，但实际的国际货币改革包括区域货币解决办法(如欧洲货币体系)和国际合作管理储备以及协调一致的多边和双边互换安排。各国政府可从历史借鉴一些经验教训，即必须协调长期和短期干预措施，并着眼于更灵活的非正式安排。

讨论

119. 许多代表团呼吁加强多边合作，确保财政和货币稳定。然而，改革努力不得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任何负面影响，也不应让其承担过重的监管负担。强调设计新监管框架时必须考虑当地的情况。

120. 许多发言者呼吁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规范制定机构和国际金融机构中的代表性。关于基金组织的治理改革，发言者强调最大股东必须批准 2010 年份额改革一揽子方案。有人呼吁扩大联合国在协调监管和财政改革中的作用。

121. 几位发言者强调，储备积累是一个正当的自我保险政策工具，其代价远低于危机对金融和经济的影响。当务之急是提高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减少自我保险的需要。发言者就潜在的货币储备制度改革、特别是于特别提款权的使用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122. 许多代表团强调，有必要兼顾监管改革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适当获得长期融资和中小企业融资问题。有人表示关切，诸如巴塞尔协议三的改革限制了发展中国家的融资机会。

123. 一些发言者指出，国家开发银行可以在可持续发展筹资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并且能够在宏观经济不稳定时提供反周期贷款。

第 9 次会议：“国际税务合作”（2014 年 12 月 9 日）

124. 基金组织财政事务部前主任 Vito Tanzi 作基调发言，概述了为增加税收促进发展可能实行的税务改革，其中包括：重新评价和重新评估既定税务原则；限制用债务替代股权；制定税务管辖区之间利润的分配方案；更多使用预扣税；更多采用从源课税；增加对避税地的压力；限制扣除知识产权使用费。Tanzi 先生提出了税务方面的所谓“曼哈顿项目”，由国际组织共同研究解决逃税和避税行为日增问题。在稍后阶段，该工作组可演变成一个正规组织(如有时建议的世界税务组织)，负责宣传税务原则和监测各国的税收政策，而非实际税收。

125. 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发展筹资办公室主任 Alex Trepelkov 致开幕词，强调公平和有效的税收制度是可持续发展筹资的核心。亚的斯亚贝巴会议有可能加强国际税务合作，并帮助确定改革优先事项。国际税务组织应促进以更加注重发展的办法来制定和更新国际税务规范，提高透明度加强信息交流机制，并加强国家税务机构。

126. 会上发言的有：联合国国际税务合作专家委员会成员 Eric Mensah；基金组织财政事务部税务政策司副司长 Ruud de Mooij；经合组织税务政策和管理中心转换定价和金融交易司税务条约主管 Marlies de Ruiter。

127. Mensah 先生介绍了《收入和资本税务示范公约》在避免对利润双重征税的同时将税收收入留在投资东道国中的作用。他指出，示范公约响应了发展中国家的关切，让一国可以根据税务条约开始对本国境内取得的利润征税前减少对传统的实体企业的依赖。这在服务经济业特别重要，在这一部门，与一国的经济交往较少依赖这种实体存在。下一版的示范公约将就某些类型的服务向来源国(无需在该国有实际存在)征收利润税。专家委员会的其他工作领域包括指导处理涉及采掘业的国际利润转移和税务问题。

128. de Mooij 先生提出了影响发展中国家的两个主要外溢效应：税基外溢效应，即一国的行动直接影响到其他国家的税收基础(如是否对国外来源利润征税的政策)；战略外溢效应，即这类政策引发了其他国家的税收政策的变化(如增加税收激励措施或减少税率)。他指出，有些问题是发展中国家特别关切的问题。其一，根据“来源国”国内法，税务条约有可能减少税收权利。其二，如何有效地对采掘业课税，包括离岸实现的资本收益课税问题。其三，如何应对普遍存在的税收优惠措施和竞相逐低提供优惠措施问题。

129. de Ruiter 女士指出，经合组织始终把导致双重征税的国际重叠作为工作重点，但现在更加认识到，经济增长还受到双重不征税的阻碍，因为多国企业往往将利润转向存在税收漏洞的地方。她解释说，经合组织和 20 国集团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项目旨在协调各国国内立法以改进税收系统的协调一致性；重新制定国际税收规范，使税收与经济活动和价值接轨；提高国际税务的透明度、确定性和可预测性。她指出，经合组织正从发展中国家磋商转为其参与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项目。

讨论

130. 一些代表团呼吁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税收政策机构中的代表权。与会者指出，小国应作为共同起草人参与全球标准制定进程，并采用现实的时间表和实施方式。

131. 一些发言者强调，必须收集更有力的数据说明国际税收体系结构的缺陷，并增强流向发展中国家的信息，打击税收违法行为。一些与会者要求摸清和解决发展中国家在努力参与国别报告机制和信息自动交流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使其从中获益。

132. 一些发言者强调，这次大会可能有助于解决用于加强发展中国家税收体制的官方发展援助不足的问题。

133. 与会者讨论了双重征税给投资和发展带来的风险，以及个别国家单方面采取的前后不一的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措施。对于这些措施，应解决涉及关税、附加值和收入所得税等方面的问题。

134. 一些发言者强调，在政府间一级仍然缺少一个全球性和包容性的国际税务合作规则制定机构，并表示支持专家委员会成为政府间机构，作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一个附属机构。

第 10 次会议：“预防和解决债务危机” (2014 年 12 月 9 日)

135. 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发展筹资办公室高级经济事务干事 **Benu Schneider** 致开幕词，提请与会者注意东亚危机之后在危机预防方面取得的进展，以及在引入集体行动条款之后在改进债券合同方面的进步。她强调，最近针对重债穷国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司法裁判表明，在应对债权人拒绝让步的问题上，仍然存在着法律上的长期缺陷。

136. 会上发言的有：美洲开发银行研究部首席顾问 **Andrew Powell**、贸发会议全球化和发展战略司司长 **Richard Kozul-Wright**；**Richard Gitlin** 公司总裁 **Richard Gitlin**。

137. **Powell** 先生提出了一些实证研究结果，评估 1979 年以来的当前金融体系的实绩。他强调，从违约到最终重组经历的延误过长，从出现债务不可持续的迹象到违约也同样经历了长时间的延误。各国采取行动的时间往往太晚，成效往往太差。他强调债权人诉讼面临诸多问题，让违约国家回到可持续经济增长的轨道面临诸多困难。他还概述了改善债券合同风险分担机制的办法，包括修订基金组织协定条款、反秃鹫基金立法、附加合同建议和制度化的备选方案，包括债务论坛和类似于世界贸易组织进程的“分解”程序。

138. **Kozul-Wright** 先生认为，如今的金融体系与 20 年前已有天壤之别，相互依存的私营部门仍然主导着金融市场，催生更多的系统性风险和不确定性。此外，不稳定的资金流对发展中国家的打击比发达国家更严重。他强调，发展中国家债务状况的性质发生变化以及许多国家债务状况改善不仅是政策改进的结果，还可以归结为有利的外部条件、资本市场的准入状况改善、大笔侨汇和贸易条件改善等因素。但是，他认为今后 15 年发展中国家将面临更加困难的状况。他列举了任何有效预防和解决债务危机的机制均应秉承的三个基本原则：由独立机构授权暂停支付；采用“贷款解决欠款”办法，确保债务危机不会进一步发展为失控的经济危机；债权人和债务人在独立仲裁员的主持下商定重组进程，以公平分担风险。

139. **Gitlin** 先生认为，国际社会还没有做好准备出台解决主权债务问题的法定制度，因为许多强国觉得并无必要。不过，他认为联合国的债务重组工作是一项积极进展。他解释说，陷入困境的国家着手解决问题的时间太迟，而且解决方案往往并不全面。事实上，这些国家应当通过一个参与式持续论证的论坛寻求政治

上可行的办法，在危机发生之前就尽早启动对话。他认为，设立一个国际主权债务论坛推动所有利益攸关方之间开展非正式讨论，能够为各国提供一个中立的对话场所，有助于各国制订出政治上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或者至少为此类解决方案添砖加瓦。这种论坛可以是一个全球公认的常设调解机构，并配备小规模的工作人员队伍，以保持债务重组的机构记忆，整合各类进程和资源。

讨论

140. 与会者认为，如果利用得当，债务是一项重要的发展融资工具。许多与会者强调，必须提高债务可持续性，并呼吁更加注重预防债务危机，而不是解决危机和重组债务。

141. 一些发言者表示支持建立一个国际债务论坛处理主权债务重组问题。一些与会者坚持必须恪守中立、问责、包容性和透明度等重大原则。

第 11 次会议：“促进科学、技术和创新”（2014 年 12 月 10 日）

142. 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可持续发展司政策分析处处长 David O'Connor 致开幕词，指出科学、技术和创新将在实现 2015 年后发展议程各项目标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必须在加快技术进步、扩大知识和技术的传播方面取得更多进展。为应对这些紧迫的挑战，必须采取政策行动，而不能听任市场决定一切。

143. 在会议上发言的有：牛津大学技术和国际发展系傅晓岚教授；马萨诸塞大学产业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 William Lazonick 教授；秘书长最不发达国家技术问题高级别小组秘书 Khalilur Rahman。

144. 傅女士列出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科学、技术和创新领域的诸多差异，如专利申请、期刊论文和研发投资的不均衡分布状况。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是信息和通信技术领域，发展中国家在这个领域后发制人的追赶脚步很快。但是，她指出，发展中国家开展的创新多为低成本的创新，缺乏资金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在政策行动方面，她建议必须在国家一级筹集公共和私人资金，为技术周期的不同阶段提供不同类型的融资。

145. Lazonick 先生说，创新最终是由企业驱动的。但是，创新是一个不确定的、集体的和累积的过程，这就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必须依靠社会关系和与大学等其他利益攸关方的协作。为此，各国应采取实施国家创新战略的战略手段，尤其需要组织整合和长期资金承诺。他还指出，在发展中国家，创新型企业改造知识实现自主创新方面起着关键作用。

146. Rahman 先生提醒与会者，最不发达国家在实现技术进步方面面临着最严峻的挑战，但却无法利用传统的技术转让机制。为解决这一问题，《伊斯坦布尔行动纲领》计划成立一个技术银行，以促成国家行动，并动员国际社会的支持。2014 年 11 月成立的高级别小组进行了技术银行的可行性研究，意在使其发挥下

述作用：作为一个科学、技术和创新支持机制，为最不发达国家的人力和机构能力建设提供协助；作为一个专利银行，帮助这些国家以协议或优惠价格获得知识产权；作为一个科学和技术托存设施，支持最不发达国家获取科学文献，并协助促成研究合作。

讨论

147. 与会者普遍认为科学、技术和创新对所有国家都至关重要，应当成为可持续发展全球伙伴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些发言者指出，发展中国家缺乏优先投资于科学、技术和创新的财政资源。

148. 一些发言者指出，在国际一级获取和转让技术十分重要。有人呼吁将更大份额的官方发展援助专款用于资助研究和开发。在这方面，与会者还提及了南南合作的重要互补作用。

149. 发言者要求国家政策侧重于技能发展和教育以及面向创新和生产能力投资的金融部门。最后，与会者强调非传统知识十分重要。

第 12 次会议：“投资体制促进可持续发展”（2014 年 12 月 10 日）

150. 贸发会议全球化和发展战略司司长 Richard Kozul-Wright 担任小组讨论的主持人。他强调，《蒙特雷共识》呼吁建立一个透明、稳定和可预测的投资环境。自此之后，各方签署了无数的双边投资协定，但发展中国家发现在各自为战的分散状况下举步维艰。在此背景下，政府间委员会呼吁国际社会探索逐渐走向投资体制的多边办法，以更充分地平衡所有利益攸关方的利益，并充分考虑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151. 小组成员有：贸发会议国际投资协议科科长 Elisabeth Tuerk；政策研究会全球经济项目主任 Sarah Anderson；塔夫斯大学法学教授兼世界银行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领导的国际仲裁法庭庭长 Jeswald Salacuse。

152. Tuerk 女士指出，近年来很少签署双边投资协定。一方面，我们观察到上升的趋势——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国际条约，其涵盖的问题范围也越来越广；而另一方面，一些国家却出现了“脱离”的趋势，最近取消或修改了国际条约。2013 年，各方共提交了 50 多宗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案件，引发了有关投资协定对国家政策空间影响的公共辩论。她列出了改革争端解决机制的一些可能途径，包括设立一个上诉机构、提高透明度和建立一个常设国际投资法庭等。

153. Anderson 女士强调，投资条约体制已深陷合法性危机，需要全面改革。她指出，一些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案件反对推广绿色能源、资本账户管制和制止吸烟的负面影响的法律，往往招致代价昂贵的诉讼，提出高额的损失索赔。她的主要建议是，应当取消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或至少要求投资者必须首先用尽国内法律救济手段。

154. Salacuse 先生表示，投资条约的重点是控制外国投资者的政治风险。如何对现有体制作出调整，使之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兼容，是一个重大挑战。他强调，各国控制着这一进程，仍然可以控制改革的方向。他提出了几项建议，包括在条约中明确和具体地承认各国的调控权利；规定各国义务不得降低卫生、安全和其他标准；更多提及可持续发展。关于争端解决机制，他建议条约应更加重视调解与和解等争端解决替代办法。

讨论

155. 一些与会者质疑投资条约是不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有效手段，并援引实例论证说，一些国家避开此类条约，却仍然获得了大笔投资。还有一些与会者指出，小经济体可能无法受益于投资条约。与会者一致认为，单凭投资条约并不足以吸引外国投资，必须采取更广泛的政策措施。

156. 与会者辩论的主题之一是应当制订一个国际投资协定的模板，将环境保障和保护纳入其他优先领域。但是，一些与会者认为单有模板是不够的，应当结合2015年后发展议程为企业部门制定一个有意义的问责框架。有人建议将最低的环境和社会标准设定为强制性标准，尤其要强调气候和生态风险。

157. 与会者呼吁发展中国家加强能力建设，以突破国家治理领域的限制；并呼吁提出一项具体建议，探索成立一个类似于贸易援助计划的投资机制。

158. 关于争端解决机制，有与会者呼吁在这次大会上对现有条约进行全面审查，暂停争端解决机制。还有人则告诫称，地方法院可能无法处理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案件，或者缺乏必要的资源。还有与会者提及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近年通过的《投资人与国家间基于条约仲裁透明度规则》，其目的是提高投资仲裁体制的透明度。

第13次会议：“贸易体制支持可持续发展”（2014年12月10日）

159. 社会研究新学院院长 William Milberg 先生致开幕词，强调指出蒙特雷会议以来国际贸易在贸易谈判、贸易模式和结构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他特别指出，大型区域贸易协定谈判已经盖过了世界贸易组织的风头，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之间的联系正在改变着世界贸易。

160. 会上发言的有：贸发会议货物和服务国际贸易及商品司司长 Guillermo Valles；科罗拉多大学社会学助理教授 Jennifer Bair；美洲开发银行一体化和贸易部门区域一体化文书协调员 Joaquim Tres；世界银行贸易和竞争力全球实践部创新科技与创业股代理事务管理员 Paulo Correa；经济和政策研究中心国际项目主任 Deborah James。

161. Valles 先生认为，贸易政策既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手段，也是发展筹资的手段之一。他强调指出，以往围绕贸易展开的讨论(例如在千年发展目标的

背景下开展的讨论)局限性过大,特别是过于专注关税问题。他强调应考虑贸易政策的许多其他因素,如非关税贸易壁垒和竞争政策。

162. Bair 女士强调,价值链的存在既不是坏事也不是好事,但是我们必须分析具体价值链的治理结构,以了解其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她强调,现在的生产涉及多个国家和企业之间的复杂关系网。国家想要出口商品就必须进口商品,因此原产地规则作为贸易协定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整个价值链的进出口位置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63. Tres 先生强调贸易对增长的重要性。他质疑贸易自由化的成效,并指出,尽管拉美地区实行大规模贸易自由化并大幅降低关税,但该区域在全球贸易总额的占比几十年来一直徘徊在 6% 左右。他介绍说,降低关税会产生新的成本,例如在贸易便利化、贸易安全和基础设施薄弱等领域。

164. Correa 先生将贸易置于减贫的背景之下考察。他强调两个相互矛盾的影响:贸易会促进经济增长,从长远来看会减少贫困现象,但从短期效应来看,贸易可能会加剧贫困和不平等现象。他强调教育和劳动力市场政策等配套政策十分重要,有助于增进贸易带来的收益。他认为劳动力流动和竞争政策尤为重要。

165. James 女士认为,贸易协议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她强调,贸易协定已经侵入与贸易无关的国内政策制定过程,各国需要政策空间来推进本国的发展战略。她反对实行基于专利的垄断,尤其是在医疗保健和气候友好型技术领域。在农业方面,她建议粮食安全政策和支持农民的目标应享有比贸易政策更高的优先级。她还建议,服务贸易规则不应强行实现交付公共服务的自由化。

讨论

166. 讨论的重大主题之一是蒙特雷会议以来贸易发生了何种变化,包括全球价值链的发展以及相互重叠的特惠贸易协定和大型区域贸易协定的增长。与会者就区域协定的大幅增长展开了辩论,这些协定造成原产地规则错位进一步复杂化,抬高了交易成本。

167. 与会者就应以交易量还是其他结果来衡量贸易的影响进行了辩论。一些小组成员认为,贸易量大总比贸易量小好,并列举了实证文献。还有一些成员坚持认为,这一结论并未得到所有情况下的经济增长证据的佐证,真正重要的是可持续发展的结果。

168. 讨论中经常提及的一点是发达国家农业补贴政策的影响及其对最不发达国家最贫困农民的伤害。有与会者提出建议:贸易便利化交通基础设施的设计应能确保贫困地区的人们能够获得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和有利的市场准入条件。

169. 讨论还涉及其他几个话题,包括将环境和社会标准纳入贸易协定和政策、贸易融资的重要性以及非法资金流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贸易不当定价。

第 14 次会议：“消除数据差距，加强统计能力”（2014 年 12 月 11 日）

170.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院长 James Manyika 致开幕词。他介绍了目前正在展开的数据革命和相应而生的大数据现象。

171. 小组成员有：世界银行发展数据小组主任傅海珊；汤森路透公司财产管理执行总裁 Ranjit Tinaikar；土耳其中央银行行长 Yesim Sisik；联合国统计司贸易统计处处长 Ronald Jansen；基金组织国际收支司副司长 Ethan Weisman；墨西哥国际发展合作署署长 Juan Manuel Valle Pere ña；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统计学专家 Papa Seck。

172. 傅女士介绍了数据革命促进可持续发展独立专家咨询小组最近的报告。她强调，全球许多地区缺乏最基本的数据，有 70 个国家缺乏监测贫困状况趋势的数据，约 30 个国家甚至没有开展住户调查。她认为，目前可用数据的爆发式进展主要受私营部门驱动，必须将其纳入公共政策之中。她强调指出三个优先领域：支持政府利用新统计工具的能力；既要推动对发展数据的睿智投资，又要防止侵犯人权和隐私；建设国家一级编制数据的能力。

173. Tinaikar 博士讨论了大数据如何有助于克服可持续发展目标投资的壁垒。他认为，大数据可以用于开展更快和更复杂的分析，从而有助于增加投资。新的开放标准允许将传统指标与其他数据(如信用卡销售或其他非结构化数据)组合在一起。他认为，引导可持续投资和信用评级的投资基准很糟糕，这是债券市场的关键瓶颈所在。他解释说，现在已经具备环境、社会和治理等方面的数据库，需要发展的是兼容性。他欢迎公共和私营部门加强合作，并建议与政府携手合作开展反洗钱领域的合规工作。

174. Jansen 先生介绍了经济和金融数据标准、手册和指南的国际体系，并强调必须对统计系统进行短期和长期投资，以满足新的需求。此外，还必须重视加强中央银行、财政部和金融市场之间的合作，并由统计局负责协调。他建议利用大数据来获得新的思路，但认为大数据并不是传统调查的替代品，而是一种补充。传统调查并不频繁，但却有必要用于充当大数据估计数的基准。

175. Weisman 先生强调，数据必须是可比较的、标准化的、统一和透明的。他指出，政府的财政统计工作最为滞后。他认为，许多国家必须努力改进基本统计数据的质量，国际机构可以通过设定可供私营部门执行的标准，促进公私合作。他宣布，基金组织正在推出一项免费的在线数据倡议：从 2015 年 1 月开始，已经上传至网站的所有数据均将免费。

176. Sisik 女士说，金融危机凸显了对更好、更及时、更具有可比性的数据的需求。她强调，目前迫切需要在“从谁处来到谁处去”的基础上编制出按金额和文书类型分列的国际资金流动数据的新数据集。不过，她认为必须从私营部门适当的受访者手中获得适当的数据。

177. Valle 先生讨论了墨西哥汇报南南合作数据的经验。他强调必须对公民保持公开透明，并应从政策制定的角度吸取经验教训和提高实效。由于南南合作由能力建设和技术援助构成，测量和评价方面的难度很大。经验分享很难衡量，因为它并非仅由援助机构提供。他强调法律框架对于透明度十分重要，并表示墨西哥支持开放式政府合作伙伴关系。

178. Seck 先生讨论了编制性别统计数据领域的进展。他警告说，我们不应误以为性别统计数据就是按性别分列的数据。在融资领域，缺乏妇女进行无偿照护工作的数据，以及妇女的资产所有权和创业数据。采用未使用的数据是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但政府应投入更多的资金用于分析和数据开放存取。他指出，只有七分之一的国家为收集性别统计数据提供了法律依据。他还强调必须了解预算和支出分配的性别影响。

讨论

179. 与会者强调为生成数据结成公私伙伴关系十分重要。与会者表示，私营部门有合作的意愿，但需要全球统计界提供开放的数据标准。还有与会者指出，公私伙伴关系不应被视为竞争性的安排，而应当看做是寻求协同增效作用的工具。

180. 与会者还讨论了资金流动数据精细程度的改进，基金组织在全球法律实体标识符方面开展的工作就是一个例证。这也涉及到商业注册处缺少实益拥有权数据的相关讨论。与会者还讨论了其他主题，包括“从谁处来到谁处去”的资料、外国直接投资的国内地理数据以及公共和私人债务证券数据的币种、期限和利率分解。

181. 与会者还讨论了隐私和保密的问题。发言者提到，给予数据安全和隐私强有力的法律保护，有助于公民和企业信任数据收集倡议。与此同时，有发言者强调，倘若无法共享个人和企业数据，可能会对一些重要的活动构成妨碍，如核查外国直接投资者的母国和东道国之间存在的不一致之处或验证贸易统计数据等。

182. 与会者要求加大对国家统计局和办事处的投资，包括增加官方发展援助，以帮助各国获得基本的数据和信息。

183. 与会者讨论了缺失数据的其他领域，包括企业对企业和个人对个人的交易；理解大数据偏差的良好基准；环境统计；残疾分类数据；企业可持续发展数据或绿色债券指数；慈善投资数据；投资机会与规则等。

第 15 次会议：“扶持性和有利的治理，包括全球经济治理”（2014 年 12 月 11 日）

184.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公共伙伴关系司司长 Olav Kjørven 致开幕词为会议设定基调，他着重指出由于生态足迹越来越大、由于社会动乱和各国及其他行为体之间的竞争，在地方和全球层面都需要建立更加有效的治理安排。

185. 讨论小组成员有：前美国众议员 Barney Frank；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纽约办事处主任 Simone Monasebian；基金组织执行主任(俄罗斯联邦)

Aleksei Mozhin; 智利政府多边事务总干事 Eduardo Galvez 大使; 美国财政部主管国际发展事务副部长帮办 Alexia Latortue; 乌拉圭第三世界研究所执行主任 Roberto Bissio。

186. Frank 先生指出, 美国和欧洲出现了偏离多边主义的大趋势, 不太愿意为国际合作而放弃一些主权。由于国内不平等加剧, 国民中普遍存在不满, 善意全面下滑。为此, 他指出美国对外国援助的疑虑越来越重, 认为如果受援国侵犯人权, 就很难使具有自由价值观的人民继续支持提供外援。他呼吁各国不要使用晦涩复杂的金融工具, 强调国家条例和机制极为重要。

187. Monasebian 女士表示, 要说服各国放弃部分权力, 就必须发现并分享成功案例。《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就是这样一个实例, 公约提出了诸如同侪审查机制等重要理念。她详细阐述了《公约》的审查机制, 机制涵盖 173 个国家, 50% 以上已经完成了审查。审查将帮助《公约》按各国的具体需要提供技术援助, 并吸纳多种多样的利益攸关方进行参与。

188. Mohzin 先生着重指出, 由于美国国会拒绝批准 2010 年基金组织改革一揽子方案, 基金组织的配额和治理改革计划被迫流产。他表示, 目前的配额确定程序比以前透明, 并采用了由以下四种变值组成的线性公式: 国内生产总值(50%), 开放度(30%), 波动性(15%)和储备(5%)。波动性这一变值对大国不利, 而对开放的小型经济体有利。他以当前的全球经济为例, 告诫人们不要对重大变革过于乐观。

189. Galvez 先生强调, 全球扶持性环境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国家政策具有重要意义。他认为, 亚的斯亚贝巴会议期间的讨论不应偏离对系统问题的关注, 各国应派遣国家元首参加会议。他支持对有关的全球机构进行改革。他并呼吁会员国不要在普遍机构外作出决定, 强调蒙特雷会议无关千年发展目标筹资问题, 而是如何通过一个包括贸易和其他执行手段的大框架帮助各国实现目标。

190. Latortue 女士强调, 全球经济治理仍在继续。她认识到多边结构支离破碎的特性, 改革的一些方面缺乏进展。但是, 已经实行了多项重要改革。另一个重要变化是, 新兴经济体正在向优惠窗口提供资金。20 国集团将是讨论全球经济问题的关键场合, 但也会顾及小国遇到的难题。她并指出了涉及共同价值和准则的问题, 例如在人权、环境和采购领域的问题。

191. Bissio 先生着重讨论了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的治理要求。他论述了经合组织成员国进行的研究, 表明公私伙伴关系的代价高于普通的公共项目, 因此提醒发展中国家不应建立这种伙伴关系。他促请会员国考虑其他办法为基础设施筹资, 指出在公私伙伴关系建立以前, 应提高混合融资的透明度, 加大监测力度, 加强尽职调查。他解释说, 政府需要在需要削减预算时, 不能逐步解除伙伴关系, 而应向投资方和国家争端解决机制处理。

讨论

192. 一些会员国着重指出，应加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代表权，呼吁改革国际金融机构，强调发展中国家需要政策空间，并强调透明度和问责制十分重要。

193. 与会者强调必须建立法治，呼吁加强合作，防止偷税漏税和资金的非法流动。会员国询问，国际会议将会提出何种切实步骤，以解决腐败问题，并为企业发展、创新和投资带来稳定。

194. 一些会员国强调，20 国集团和 7 国集团应顾及小型经济体的利益。民间社会代表提议，政府不应等待 20 国集团或金融稳定委员会采取主动，而应该邀请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参加定期会议，完善发展筹资过程中的多边利益攸关方对话。

195. 企业部门代表建议更多的国家通过国际金融公司标准，并建议对公私伙伴关系采取平衡的方式，考虑各种备选方式，加强执行工作，包括利用官方发展援助调动私人融资，并为国家建设项目设置和执行能力。

第 16 次会议：“从伙伴关系中学习”（2014 年 12 月 12 日）

196. 塞内加尔经济、财政和规划部副部长 **Birima Mangara** 发表主旨讲话。**Mangara** 先生以塞内加尔的“新兴塞内加尔”计划为例，提出必须精心设计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为本国的发展愿景提供支撑。这种战略应具有包容性，并纳入可持续发展的三个层面。他指出，新兴塞内加尔计划吸收了各种资金来源，包括国际合作、创新融资计划和公私伙伴关系。为执行计划，设立了一个战略投资基金，成立了国家发展银行。他强调，鉴于流入塞内加尔的汇款数量可观，决策者希望设计各种机制，加强汇款对发展的影响力。

197. 会议由纽约新学院国际事务研究生班的高级访问研究员 **Barry Herman** 主持。他强调，千年发展目标 8 和《蒙特雷共识》所体现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不同于具有多边利益攸关方性质、为实现特定目标或要务而建立的伙伴关系。

198. 会上发言的有：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所长 **Jeffrey D. Sachs**；全球环境基金首席执行干事兼主席石井菜穗子；符合全球疫苗和免疫联盟资格国家驻联盟特别代表 **Mercy Ahun**；世界银行独立评价小组国家、企业和全球评价主任 **Nick York**。

199. **Sachs** 先生强调，国际公共资金仍然必不可少，不应由私人资金流动取代。他指出了公私部门筹资的互补性，并重点阐述了三种公私伙伴关系：为穷人提供服务的伙伴关系，如全球疫苗和免疫联盟(免疫联盟)和全球防治艾滋病毒/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在基金中私人公司与公共部门和公共资金密切合作)，这类关系同样可以在教育等其他部门采用；深层技术改革的伙伴关系(公共部门参与对实现技术突破至关重要)；以及为大规模发展能源系统和基础设施建立的伙伴关

系(私人投资需要公共部门的指导)。他说,国际会议将是明确这些伙伴关系并为可持续发展投资释放储蓄资金的一个独特机会。

200. 石井菜穗子女士回顾了全球环境基金服务一些多边环境协议的历史,并指出了基金与公私部门人员建立伙伴关系的经验。她表示,公私伙伴关系可在能源系统、城市和土地使用这三个关键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具体而言,这种伙伴关系有助于减少私营部门的风险,促进创新和投资;有助于打破国家政府内部各自为政的做法,促进将环境可持续性纳入国家政策的主流;并有助于提供全球公益物(如在气候和海洋领域)。

201. Ahun 女士列举了免疫联盟取得的成就,表示联盟是在最贫穷和受冲突影响最大国家开展业务的一个成功和独特的国际公私伙伴关系的实例。免疫联盟遵循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支持国家优先工作和计划,因此采用了国家驱动方式。免疫联盟明确地把帮助各国脱贫作为工作重点,并在可行的情况下立即帮助这些国家实现到自我融资的过渡。免疫联盟还通过大规模供资建立全球疫苗市场,得以低廉价格提供疫苗。除私营部门外,免疫联盟还与联合国系统、民间社会和私人慈善家密切合作。

202. York 先生介绍了世界银行对 23 个伙伴关系的评价结果。他指出,伙伴关系提供了利用利益攸关方力量和专长的机会,并在提升具体问题的关注度方面也常常起到实效。但是,人们关切地注意到各种伙伴关系支离破碎、缺乏国家所有和脱离国家要务以及治理和监测结构薄弱等问题。他提出,在建立新的结构方面需要有更加严格的纪律,并应包含“日落条款”。他呼吁制定透明度和问责制共同标准。

讨论

203. 关于基础设施中经常采用的国内公私伙伴关系对 2015 年后发展议程筹资可能作出的贡献,与会者发表了不同观点。与会者提及了成功项目和失败项目。一些与会者提醒说,如果这种模式在发达国家没有成功,也就不太可能在发展中国家取得成功,私营部门不会进行参与并投资教育等没有市场回报的领域。

204. 关于全球伙伴关系,一些代表着重指出,伙伴关系的活动应与国家优先工作挂钩。与会者认为使用国家系统也很关键,呼吁提高透明度,改善数据,以提高业绩评估的效力。与会者建议,伙伴关系良好做法(包括传统的基于项目的公私伙伴关系和全球多种利益攸关方的伙伴关系)采用的方针和原则应成为国际会议的成果。

205. 会议一致认为,双边和多边方式都可在发展合作中发挥切实作用。但是,一些与会者提出,加强多边方式,同时避免建立大量新的机构,可以加强发展合作的实效。

第 17 次会议：“后续进程”（2014 年 12 月 11 日）

206. 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发展筹资办公室主任 Alexander Trepelkov 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概述了蒙特雷会议和多哈会议以来发展筹资后续进程的新情况。他强调，多方利益攸关方对话是一个显著特点，但指出这一进程日渐式微。以前的改革提议没有成功是因为缺乏政治共识。他强调指出，有必要推出有效的后续进程，对亚的斯亚贝巴达成的各项协议的执行进行有效监测。

207. 会上发言的有：危地马拉前财政部长 María Castro；布鲁金斯学会全球经济和发展方案高级研究员 Amar Bhattacharya；全球伙伴协会主任兼青岛大学国际和联合国问题研究教授 Oscar de Rojas。

208. Castro 女士强调指出，应把发展筹资作为执行 2015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一种手段。国际会议应该特别强调国家的公共筹资。联合国可以在推动防止逃税的国际合作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并确保最不发达国家参与这个过程。她强调，应建立机构伙伴关系，尤其是与新的金融机构建立伙伴关系。加强后续进程需要巩固联合国和布雷顿森林机构之间的合作，以确保可持续发展筹资有充足的资源。

209. Bhattacharya 先生说，对于调动国内资源和引导需求而言，国家一级都是采取行动的主要层面。将在国家一级建立监管框架，制定财政政策，建立公私伙伴关系，结束无效的补贴，确保可持续性。国家一级的行动应得到国际一级集体行动的支持，并建立问责框架。如果所有利益攸关方都坚定不移地推动发展筹资进程，亚的斯亚贝巴会议就能够加强后续进程。总之，应该把后续进程作为一个持续不断、独立于几年一次会议的进程。

210. de Rojas 先生指出，尽管早期进行过多次尝试，但发展筹资进程并没有建立起稳固的后续机制。他认为，加强后续进程的最佳办法是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成立一个专门的职司委员会，负责履行监测和后续职责。他强调指出，系统性问题，特别是支持发展的国际货币和财政体制的连贯性，将是发展筹资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会员国的普遍性，联合国将是采取合理参与方式的最佳场所。发展筹资进程成功解决系统性问题，将为成功制定 2015 年后发展议程奠定基础。

讨论

211. 许多代表团强调，应把亚的斯亚贝巴会议视为对 2015 年后发展议程的重大贡献，应确保发展筹资的后续进程为其监测工作和问责框架做出贡献。

212. 一些发言者提到了在获取数据监测商定措施执行情况方面的困难。加强数据收集处理能力将是有效后续机制的重要部分。会议建议设立一个支持国家收集处理数据的全球基金。

213. 民间社会代表呼吁建立有力的问责框架，责成国家政府对其他国家政府并对民间社会负责。会议指出，发展中国家不应背负过重包袱，框架应该以下列六项原则为基础：参与、人权、公平、公开透明、诉诸司法和法律、问责制度。

214. 企业部门代表着重指出，国家和地方政府应就问责制度建立联系，并强调技术对成功项目的数据传播和监测作用重大。

五. 结论

215. 第三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筹备进程共同召集人感谢全体与会者对会议所做的贡献，并重申国际会议将为 2015 年 9 月举行并通过 2015 年后发展议程的首脑会议的成功做出重大贡献。

216. 共同召集人在闭幕词中概述了 2014 年 10 月至 12 月 8 天实质性非正式会议提出的一些要点：

(a) 亚的斯亚贝巴会议应当处理《蒙特雷共识》和《发展筹资问题多哈宣言》的遗留问题，并应对新出现的难题；

(b) 调动和有效利用所有资金来源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分关键，包括国家和国际、公共和私人以及混合的资金流。各种资金来源必须相辅相成。官方发展援助依然十分重要并具有现实意义，但鉴于议程范围广泛，官方发展援助将出现缺口；

(c) 亚的斯亚贝巴会议筹备进程将全面考虑以下两个方面：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问题会议成果文件阐述、以消除贫穷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经济、社会、环境层面一体化为重点的可持续发展整体愿景，以及有关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建议；

(d) 亚的斯亚贝巴会议应该是“蒙特雷会议的加强版”。会议将提出可持续性和普遍性等新的内容。对此，会议强调指出基础设施、中小型企业、创新和清洁技术等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面存在筹资缺口。

217. 共同召集人认识到，实质性非正式会议期间就许多方面提出的各种具体建议，将有助于建立稳固的可持续发展筹资战略框架，包括可持续发展目标。他们强调，未来的主要任务是对更新框架以及具体的可交付目标达成一致。